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前期古巴共黨的演變

doi:10.30390/ISC.198306_22(9).0008

問題與研究, 22(9), 1983

Wenti Yu Yanjiu, 22(9), 1983

作者/Author：劉天均

頁數/Page：90-10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83/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6_22\(9\).0008](http://dx.doi.org/10.30390/ISC.198306_22(9).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前期古巴共黨的演變

劉天均

一、前言

當拉丁美洲各國在十九世紀初葉（一八〇〇—一八三〇年）先後掙脫西班牙帝國的殖民統治而宣告獨立時，位於加勒比海上的古巴卻被其宗主國——西班牙譽之為「永遠忠貞的寶島」。然而好景不常，馬德里王室的美夢終於被古巴的「自由呼聲」（El grito de Yara）所驚破，隨即爆發了十年的革命之戰（一八六八—一七八年）。接著又在一八九五年點燃了第二階段的獨立戰火，其間由於「緬因艦事件」（U.S.S. Maine）而導致一八九八年的美西之戰，結果為古巴帶來了「獨立」。嗣後這個新興的國家又在美國的「監護」下，渡過了三十四個「沒有犯錯自由」的「自由」歲月^①。

「獨立」並沒有給古巴人民帶來如期的幸福，相反的，由於舊主人所遺留下來的長串問題，無法解決，新主人又為他們增加了一層新的剝削與轄制。在新愁與舊恨、挫折與失望、憧憬與幻滅的錯綜心理下，社會上出現了一系列的歐式政治思想和相應的政治集團或政黨組織，如民族主義、工團主義（辛提加主義）、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共產主義和信仰上述各式主義的黨派。後者即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對象。

首先，我們知道：「古巴共產黨」這個特稱名詞，指涉著兩個不同來歷、不同體系的共黨組織；換言之，在同一個名稱下，統攝著兩個異質組織的實體——「古巴共產黨」；申言之，古巴共黨就其組織緣起、遞變、沿革與繼承過程言，可分之為「正統共黨」與「非正統共黨」、「舊共產黨」與「新共產黨」；就其存在的時間言，可分為「前期共產黨」與「後期共產黨」；前者

註① 關於美國對古巴的覬覦和協助古巴革命的動機與手段，請參Hubert Herring,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Alfred Knopf, 1957), pp. 397-411; Joseph Hansen, *Dynamics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8), pp. 19-64, "The Truth about

Cuba", 古巴自一八九八年底獨立後，曾在美國的軍管下被統治了三年（一八九八—一九〇二年），爾後又在Platt Amendment條款的束縛下，作了美國實質上的「保護國」達三十二年之久。在美國直接與間接的支配期間，古巴在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個基礎和上層建築層面，均發生了影響深遠的變化。諸如外國資本的大量介入與遙控、殖民地經濟形態的高度發展、工人階級的出現、待業及失業人口的增加、獨裁政治及官僚制度的建立、歐式政治思潮的湧入等，使年輕的古巴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這是「前期古巴共黨」建立及其初期政治活動的社會背景。

是「第三國際」的產物，係致命於共產祖國——蘇聯；後者則是由民族主義的「七·二六運動」為骨幹，以僭取、篡奪的手段，經由聯合兼併的途徑，將幾個異質的政治黨派（其中包括「正統共黨」）^②拼湊融合而成的「革命」組織，亦即是今日人盡皆知的「古巴共產黨」——卡斯楚主義的「古巴共產黨」。本文對此不加討論，擬僅就前者之緣起與發展、黨員的性質與心態、黨的基本路線與政策、重大政治活動與內外環境的關係，以及其對當時場地的認識與評估作為政策導向而產生的差誤，試作歷史的探討，以明其興衰隆替的原因。

二、前期古巴共黨的興起

一九二五年秋（八月十六日），古巴共產黨在哈瓦那的「公園區」召開了成立大會。這個新成立的共黨組織是由下面的兩個社會主義團體——「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與「哈瓦那共產主義組合」（Agrupación Comunista de la Habana）合併而成。前者建立於一九〇五年，曾參加社會主義國際（第二國際），後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與蘇共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影響而日益左傾，遂脫離溫和的社會主義路線，而逐漸轉向共產主義；後者則是出現於一九二三年左右的共產主義複合體，它包括一個由數名猶太人所組成的「希伯萊人小組」（Hebrew Section），和另一個由一名波蘭籍共黨分子所領導的「青年小組」^③，以及由古巴工運人物，如洪高（Sandalio Junco）、雷勞（Alejandro Barreiro）和知識分子裴瑞玆（José Miguel Pérez）等古巴人所組成之共產主義小團體。

當時古巴共產黨之所以能將如許不同隸屬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小組織，聯合起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共黨，係得力於墨西哥共黨的協助^④。其時墨共派遣了一位名馬貢（Enrique Flores Magon）者從中奔走遊說，終將上述幾個零零散散的社會主義小團

註② 從卡斯楚領導之「七·二六運動」（七月二十六日運動）所兼併的黨派與兼併過程言，大致如下：一九六一年由「七·二六運動」、「人民社會主義黨」（即共產黨）、「學生革命委員會」等組成一個鬆懈的「統一革命組織」（Organizaciones Revolucionarias Integradas-ORI）；一九六二年因發生「埃斯卡蘭德奪權事件」，遂於次年改組為「社會主義革命統一黨」（United Party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PURS）；再演變至一九六五年十月，在卡斯楚的權力鞏固後，又恢復了「古巴共產黨」的這塊舊招牌。

註③ 該波蘭籍共黨分子名Fabio Grobart，於一九二三年參加波共，後來以Abraham Simkowitz 假名移民古巴。據說他是「第三國際」的一名黑手，但查無實據。然而從他的工作業績觀之，他對古共的建立與黨員思想的訓練，均貢獻良多，是前期古共元老功臣之一。參 Boris Kozolvyh, "The Political Biographies of Three Castro Officials", RAND, RM 4994, Re. May 1966.

註④ 墨西哥共產黨建立於一九一九年九月，它是由兩個「第三國際」的要員——印度籍的羅易（Manabendra Nath Roy）和俄人鮑羅廷（Michael M. Borodin）二人負責領導的。鮑、羅二人是近代中國人所耳熟能詳的人物，彼等對中共的影響程度，不下於對墨共的影響。當時墨共之所以能派遣一名代表前往協助古共之建立，其意義當非尋常，是否係奉「第三國際」之命，尚不得知。

體拉在一起，成立了「正統的古巴共產黨」^⑤。

古共初成立時僅有黨員八十人^⑥，參加成立大會的各方代表只十八人。大會選舉了一個九人中央委員會，由工運領袖裴瑞茲擔任第一任書記。古共甫告成立，即遭到當時馬加杜（Gerardo Machado y Morales）政權的取締與圍剿^⑦。總書記裴瑞茲被捕而遭放逐（裴氏係西班牙籍），其第二號人物梅野（Julio Antonfo Mella）^⑧也遭到同樣的命運。其他中上幹部在大難臨頭時，各奔東西，或逃或隱，或棲身「工聯」（詳後），或浪跡江湖。至此，這個在加勒比海島嶼上初生的赤色嬰兒幾乎夭折。

然而古共的命運正驗證了老子的一句哲諺——「禍兮福所依」。誰知摧毀古共的是馬加杜，幫助古共復甦的還是馬加杜。因為馬氏爲了鞏固其政權，消除其政敵，除了向古共施加高壓外，並同時竭力打擊國內的其他極左組織，如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他們在馬加杜的追討下，悄悄地隱身於「古巴全國工人聯合會」（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 Obrero Cubano—CNOCC）^⑨，再從「工聯」轉身爲古共分子，因此使已潰不成軍的古共獲得了一批新血輪。其中對古共復甦貢獻最力者爲馬蒂乃茲（Ruben Martinez Villena），他以律師的身分，一面爲維護「工聯」的合法地位與基本權益而努力，一面在暗中爲古共網羅了許多新幹部，從此古共便積極地發展其地下組織。

三、前期古共黨員的心態

古共既然一開始即遭遇到致命的打擊而被迫轉入地下，或附隸於「工聯」而苟全，在客觀環境的限制下，其組訓工作自付闕

註⑤ 關於古共之成立經過及概況，請參 Pedro Seriat, *40 Aniversario de la Fundación del Partido Comunista* (Havana, 1963) 一書。

註⑥ 「社會主義工人黨」黨員五十三人，「哈瓦那共產主義組合」僅有二十七人。

註⑦ 馬加杜總統（一九二五—一三三年）在位期間，向以貪婪、殘忍、巧詐、高壓、權術著稱，時人給他一個封號：「加勒比海的希特勒和一隻嗜血的大怪獸」。

請參 Mathaniel Weyl, *Red Star over Cuba* (New York: Devin-Adair, 1960), p. 54.

註⑧ 梅野原爲民族主義分子，曾任「大學生聯合會」主席，後對共產主義發生偏愛，思想極端左傾，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被捕後，遭放逐而流亡墨西哥，參加墨共，被選爲中委，並一度擔任墨共總書記（一九二七—二八年），後爲墨共右派所忌。旋於一九二九年元月十日被馬加杜所僱用的槍手殺害，但另有傳說，謂其爲第三國際的特務 Contreras (Vittorio Vidali) 所害，惟無實據。請參 Boris Goldberg,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rty: The Cuban Communist Part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IX, No. 4 (Jul.-Aug. 1970), p. 64.

註⑨ 「古巴全國工人聯合會」成立的時間與古共成立的時間相同，在名義上是個獨立的民間社團，實質上是古共的外圍組織，但由於它沒有參加政治性活動，而爲馬加杜政權所暫時容忍，直至一九三〇年發動大罷工時，始被禁止。

如，所以黨的組織非常鬆懈，甚至連基層小組都未曾建立；而黨員的心態依然充滿了伊比里安文化的傳統觀念，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因此，他們忽視組織，缺乏紀律，甚至連領導幹部也多不知共產主義與馬列思想為何物。他們僅憑傳統的革命激情，或原有的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乃至虛無主義的極左思想，一味地堅持進行「反帝、反殖和反專制」的「三反」路線；而不知採取「最低綱領」以爭取廣大農工羣眾的支持，遂使古共組織成爲一個微不足道、缺乏羣眾基礎、沒有思想武裝、尙未「布爾什維克化」的「少數團體」，而不是一個「職業革命家黨」。因此，當時第三國際曾透過美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轉達了一通批評古共的文件，認爲古共的組織力與領導才能均不足適應古巴革命情勢的發展，更難以在革命情勢來潮時，承擔起反帝、反殖、反專制的先鋒使命，故要求古共立即實施「布爾什維克化」，以強化組織功能，改造一般黨員的意識形態，提高領導階層的理論水平和組訓能力^⑩。

四、第三國際的支部與工具

一九二四年秋，第三國際第五次大會時，始注意拉丁美洲各國共產黨的發展情形，遂決議設立「南美書記處」。次年夏該「書記處」在阿根廷首府布宜諾斯艾里斯成立，由阿共總書記擔任書記^⑪；一九二六年春第三國際五屆六次擴大執委會復決議設立「拉丁美洲書記處」，由國際執委之一主其事，負責直接推動拉丁美洲的共產事務，並轉達第三國際的命令與任務^⑫。

古共於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時，始正式加入共產國際，其代表羅培茲（Lopez）當選爲國際執委會的候補委員。此後直至第三國際於一九四三年解散爲止，古共在「無產階級國際義務」及加盟二十一項條件（特別是第十六條）^⑬的強制下，成爲第三國際唯命是從的支部、工具與代罪羔羊——爲第三國際的錯誤政策或不當命令而負荆請罪乃至被整。

在第三國際對古巴共黨要求實施「布化」後，古共黨員的基本心態、紀律觀念、理論水平、領導能力、組訓活動，以及政策路線等，雖略有改進；但在第三國際或蘇共的標準下衡量之，必須及時地予以整頓。此外，古共內部的領導階層尙有部份反國際分子，阻撓國際路線的執行，須藉機加以清除。一九三〇年三月由古共所發動的罷工事件剛好爲第三國際整肅異己分子，製造了

註⑩ 關於第三國際時當時古共的批評與要求，請參 *The Communist (CPUSA)*, Vol. X, No. 1, January 1931; See Boris Goldenberg, *Op. cit.*, p. 65.

註⑪ *Jane Degras*, ed.,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London: Frank Cass, 1971), p. 354.

註⑫ *Ibid.*, pp. 572-573.

註⑬ 第三國際於一九二〇年二次大會通過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二十一條規約，其中第十六條規定：凡大會及執委會所通過之決議案，共產國際全體分子黨均有服從之義務……請參 *Jane Degras, op. cit.*, Vol. 1, pp. 171-172.

條件與藉口。

第三國際對這次罷工事件後所得的評鑑結果，認為古共在政策及策略兩個層面均犯了錯誤——既犯了「右傾」又犯了「極左的冒險主義」的「幼稚病」。「右」的毛病是：與其他「革命」黨派合流，一同要求制訂勞工法、恢復民主制度、反對馬加杜專制政權等，而未能站在無產階級前衛的立場上，為工、農廣大羣眾的實質利益，提出主張；而「極左的冒險主義」則是在罷工進行期間所提示之「永不妥協」的鬭爭口號，實等於迫使馬加杜政權作「困獸之鬭」，而禍及己身。該項評鑑並且認為「右傾」的行動，幾已湮沒了古共與其他民主資產階級政治勢力的界限，且使古共淪為他們的「尾巴黨派」；而極左的口號同樣地為古共製造了不利的情勢，即將馬加杜這股反動勢力的禍水完全引到古共的頭上，成為鼓動罷工的罪魁禍首，而獨蒙其害^⑭。古共在這既「右」而又「左」的罪名下，接受了第三國際對它第一次所施加的「整肅手術」。

共產國際「加勒比局」(Caribbean Bureau of the Comintern)在國際執委會的指揮下，對古共的領導階層展開了一次局部的整肅行動。在這次和風細雨的整肅中，以工運頭子洪高(Sandalio Junco)為首的幾個反國際派分子^⑮，被開除黨籍。

古巴共黨在親國際派分子馬蒂乃茲(Ruben Martínez Villena)的策劃下，首先加強古共的地下組織工作，使由古共所支配的「古巴糖業工會」加入「古巴全國工人聯合會」，協助古共發展其基層組織與掩護其非法活動，因而擴大了古共黨員的人數——從一九三〇年的五百人增加至一九三三年的一千餘人^⑯。其時糖工在「工會」的策動下，建立了自衛隊，甚至在某些較大的糖廠內設立了類似「蘇維埃」式的工人代表組織。工人在古共及偏激分子的煽動下，經常在各地發起反美與反專制運動，使古巴社會呈顯着一片動盪不安的現象。

製造社會動亂與利用社會動亂，是共黨所慣用的鬭爭戰術之一。古共乘社會動盪不安之際，與另一個非法組織ABC^⑰共同支持「工人聯合會」於一九三三年七月發動一次全國汽車工人大罷工運動。罷工的風潮很快地從哈瓦那蔓延至其他城市，從汽車工人傳染至社會各階層——農民、學生、教員、律師、商人乃至公務員。而且罷工的性質已從單純的勞資糾紛和工人權益問題，

註⑭ Boris Goldenberg, *op. cit.*, p. 66.

註⑮ 洪高自一九二六年加入古共後，即負工運之責，曾於一九二九年赴莫斯科考察，返國後便開始反對第三國際的政治路線，並在黨內發展自己的力量，成為實際必須清除的對象。洪氏被整後，即自組「青年古巴黨」，後於一九三六年與「古巴革命黨」合併，擔任該黨勞工部部長職，以其從前負責工運之經驗與所建立之關係，對古共工運工作構成重大威脅，故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被古共所唆使的流氓所殺害。

註⑯ 此時古共僅在 Santa Clara 一省的黨員人數即增加了六倍，但黨員的素質與「布化」的程度仍無顯著的提高，只是人頭數目的加多而已。

註⑰ ABC 三個字母不代表任何意義，也不是任何字的縮寫，它只是一個特殊民間組織的代號。該組織係由一羣反現實的大專師生於一九二九年所組成，類似一個「虛無主義」的恐怖團體，專門從事暗殺政府官吏以及對付馬加杜的特務組織——Porristas。請參 Hubert Herring, *op. cit.*, pp. 407-408.

轉變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及社會問題^⑮。在罷工風潮的侵襲下，馬加杜政權幾乎完全喪失其控制能力，全國已陷入無政府狀態。然而正當羣情沸騰、民心激昂、罷工運動在各地如火如荼的進行時，古共突然接到第三國際執委會的指令，要求古共立即設法中止罷工，以免美國為維護其切身利益而直接出兵干涉^⑯。古共只有奉令行事，馬上要求羣眾停止罷工，罷工羣眾非但充耳不聞，反譏古共是工賊、叛徒、帝國主義的走狗。更為不幸的，美國對此次罷工運動確有反應，但不是直接的軍事干預，而是遵循著政治的途徑，透過其駐古大使威爾斯(Summer Welles)，向馬加杜提出「忠告」，勸其讓賢，結果這位「加勒比海的希特勒」不得不在八月十二日悄悄地飛往巴哈馬羣島去「渡假」了。

古共是這次罷工運動的最大犧牲者。它不僅因為中途阻止罷工而毀壞了自己的形象，並須為第三國際錯誤政策曲意辯護。尤有進者，第三國際執委會非但不為其失策而罪己，反而歸咎古共領導階層執行「命令」之不力，採取了第二次整肅行動。國際執委會於一九三四年元月派遣其代表，前往古巴監督古共的整肅工作。首先以工人階級出身的羅卡(Bias Roca)^⑰取代了病重的總書記馬蒂乃茲(Ruben Martinez Villena)，接著又整頓了古共中央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將部份與馬氏關係較深的知識分子予以清除^⑱。

五、羅卡領導下的古共

羅卡在第三國際的「聖旨」下，成為「欽定」的古共總書記後，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召開了第二次大會，對以往的政策與路線作了總結性的檢討與批判，對未來的基本方針與鬭爭策略作了原則性的規劃。大會決議指出：古共迄今仍未建立穩固的羣眾基礎，而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程度尚嫌不足；黨的領導分子仍然存留著機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因此必須加強思想和紀律教育；古共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仍然面對著左翼的托派和社會主義改革派，以及右翼的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買辦階級黨派的

註^⑮ 罷工運動的口號：實施八小時工作制，解決失業問題；取消農工階級的債務，後延政府對美國外債的償付期；懲治貪官污吏，把嗜血的馬加杜趕下臺；釋放政治犯；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等。

註^⑯ 古共於一九三四年開始就停止罷工的決策，作如下的解釋：中央委員會當時確信，如對馬加杜政權採取過激的鬭爭行動，恐怕招致帝國主義的干涉，這是要求停止罷工的真正原因。古共不敢聲明停止罷工係出自第三國際的命令，更不敢宣示「過激的鬭爭行動的招致帝國主義的干涉」之類的預測純粹是執委「軍師」們對美國態度的過分反應。

註^⑰ 羅卡原名 Francisco Caldrio 是工人出身，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但富有組織能力，自一九三〇年以來，對古共地下組織的發展，頗多貢獻，而且是一個真正無產階級出身的共黨黨員。

註^⑱ Andrés Suárez, Cuba: *Castroism and Communism, 1959-1966* (Cambridge: M. I. T. Press, 1967), pp. 2-3.

威脅；黨在工運、兵運及農運方面，均落在「革命」形勢之後。同時，古共承認，以往在政策及路線上所犯之錯誤，大部份導因於：在決策過程中未能對當時的政治環境作出正確之研判^②。

在羅卡取得古共領導權之前後，古巴內外發生了兩件支配著古共政策的大事。其一爲一九三三年九月由巴蒂斯達 (Fulgencio Batista) 所發動的「士官政變」^③，它爲古共的政策設計提供了物質條件；其二爲一九三五年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所通過之「聯合陣線」決議案^④，它成爲羅卡制訂政策時所遵循的指南。在上述客觀情勢下，古共所遵循的基本路線是溫和而有節制的左傾。其執行此一基本路線的策略爲：繼續奉行共產國際的命令，但須審慎地理解並配合當時的國情，而非盲從；在國內進行政治鬥爭及製訂政治口號時，應基於自身（古巴與古共）的利益，避免採取過激的反資、反帝的措施；以「既聯合又鬭爭」的兩面手法，爭取自我發展、壯大、合法以及參與政治的機會。甚至不惜甘冒「機會主義」的政治風險。

古共自遭遇了一九三三年及次年春兩次罷工的大失敗以來，不僅聲譽狼藉而益形孤立，甚至黨員人數也日趨下降，從六千人減爲四千。此類痛苦的經驗爲好戰成性的古共提供了極爲寶貴的反面教育，使其從極左的路線上逐漸向右修正。一九三五年春，古共向右邁出了一大步。在是年三月的罷工與示威運動上，古共自始至終保持置身局外的立場。此一態度的轉變，正足以顯示其基本路線的取向。另一項影響古共政策的積極因素，是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聯合陣線」。

爲了適應當時內外情勢發展的需要，古共中央於一九三六年春就其必須建立「聯合陣線」的時機作了如下的評估：當古巴革命情勢進入全民奮起的階段，對其他社會階層（係指除農工無產階級外）所扮演的革命角色，非但不應予以低估，而且須將其運動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結合，藉以擴大革命運動的基礎，建立廣泛的「人民陣線」，一致對抗外國的侵略者（不再提「法西斯主義」和指名美帝）^⑤。

然而由於古共樹敵太多，聲譽太壞，其欲建立「人民聯合陣線」的政策，非但不能順利進行，而且到處碰壁。它向「青年古

註^② Resolutions of the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P of Cuba "The Present Situation, Perspectives and Tasks in Cuba", in *The Communist*, Vol. XIII, No. 11 (Nov. 11, 1934), as quoted in Goldberg, *op. cit.*, pp. 68-69.

註^③ 巴蒂斯達在一九〇一年生於古巴東部的一個農業家庭。曾作過蔗農、蕉工、酒吧服務生、理髮師等，二十歲時在軍中擔任文書士官職，結交了許外士兵朋友。當一九三三年七月至九月的大罷工風潮掃過古巴全島時，他勾結其同夥發動了所謂「士官政變」。此後，他以間接或直接的方式控制古巴政局二十五年之久（一九三四至一九五九年）。自一九三四至一九四〇年，七年之內有七位「總統」因他而立，也因他而廢；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他自任總統；一九四四

至一九五二年，他雖在野，但間接影響政情；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九年初被卡斯楚所推翻時止，他以獨裁者和暴君的雙重身分主宰著古巴。

註^④ 第三國際「就法西斯主義、工人階級聯合、國際任務」之決議案。參 Degras, *op. cit.*, Vol. III, pp. 355-370.

註^⑤ Goldberg, *op. cit.*, p. 71.

巴]接近而遭拒，復向「古巴革命黨」(Partido Revolucionario Cubano—PRC或通稱之為「法統黨」(Auténticos))提出建議而被斥，甚至被該黨視之為「不革命的熱帶共產主義者」。經過一番積極遊說和奔走後，僅僅與其他幾個小的黨派組成了一個貌合神離而組織鬆懈的「聯合委員會」²⁶而已。

古共在倡組「聯合陣線」方面走投無路時，遂掉回頭來向及其主子第三國際所一向攻擊的「軍事強人」巴蒂斯達靠攏。究竟爲什麼古共要在此時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討好一個惡名昭彰的獨夫，而巴某又願捨棄舊嫌去接納古共的「輸誠」呢？無他，相互利用、各自爲謀而已。古共欲借重巴蒂斯達對政治的影響力，使自己獲得一個合法的地位，以便公開參與政治；而巴某則企圖藉古共在工農階級中所建立的羣眾基礎，去擴大自己的政治地盤，以備一九四〇年的大選能順利問鼎總統寶座。雙方既有這種默契，便自一九三八年春開始進行了骯髒的政治交易。是年春，古共表示支持修憲（爲巴蒂斯達競選總統鋪路），而巴氏則透過其傀儡總統布魯(Federico Laredo Brú)²⁷於年初宣佈政治大赦，古共因此可以公開活動。

古共在巴蒂斯達的「護航」下，一九三八年勞動節時即發行了自己的機關報「今日新聞」(Noticias de Hoy)和刊物「中天」(Mediodía)，九月二十三日取得合法的地位。合法化的古共便趁機擴大其組織力量，在次(一九三九)年元月與其外國組織「革命同盟黨」(Partido Unión Revolucionaria—PUR)²⁸聯合組成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聯盟」(Unión Revolucionaria Comunista—URC)。其時，「聯盟」的古共已擁有黨員兩萬三千餘人。當這股力量與巴蒂斯達一夥勾結在一起時，立即在古巴的其他政治黨派間引起了震撼：或表憤慨，或感驚訝，或抱憂懼，或喊反對。而最令別的政黨人士憂心忡忡者，是一向在古共控制下的「工會」團體，將從以往與政府對立的立場，轉變爲中立，乃至蛻化爲巴蒂斯達御用的工具，或在選舉活動中成爲古共與巴氏政治利益的掮客，對當時的古巴政局構成極大的威脅。

巴蒂斯達在古共的支持下，贏得了一九四〇年七月的大選，順利地使其統治權力取得合法化和正統化的地位。而古共從巴氏政權手中所獲得的另一項大獎，則是兩個不管部部長的職位：古共的合夥人——「革命同盟黨」的頭子馬里奈略(Juan Marinello)於一九四三年春入閣，接著就是古共的第二號人物羅德雷格茲(Carlos Rafael Rodríguez)的被任命。除了獎勵之外，還有其他的政治紅利，即由古共所一手掌握的「古巴工人聯合會」(Confederación de Trabajadores de Cuba—CTC)也從此取得了法律的保障。在法律「保障」之下的「工聯」組織，確從巴蒂斯達政權的社會福利政策中，獲得一些權益，但其工運活動

註²⁶ 該「聯合委員會」係由古共、Apristas 黨、「青年古巴」之部份黨員及旅居海外的某些政異分子所組成，延至一九四〇年即自行消失了。

註²⁷ 布魯原爲哥麥茲(Miguel Mariano Gómez)總統之副。哥氏於一九三六年初當選總統，當年年底被巴蒂斯達在幕後發動的彈劾案所逼下臺。

註²⁸ 「革命同盟」係由古共的同路人馬里奈略(Juan Marinello)於一九三七年年組成，它實際上是古共的「影子黨」，只是「招牌」不同而已。馬氏在併入「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後，在名義上擔任該「聯盟」的主席。

卻在「利益均沾」的前提下，日趨沉寂了。

自從古共與巴蒂斯達相互提携以來，古共邁進了一個黃金時期，它的組織較前擴大了，黨員人數直線上昇^②，黨在政治領域中的影響力也因而大為提高。所以，羅卡曾為其「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作出如下的評價：「共產主義革命聯盟」在其奮鬥過程中，已取得一次空前的勝利。然而古共為贏得這次「勝利」所付出的代價畢竟太大了！這代價是：「聲譽掃地、地位孤立、樹敵太多、失去鬪志。其影響之深遠，適足以註定爾後敗亡的命運。」

六、「人民社會主義黨」時期的古共

一九四一年秋，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古共為配合巴蒂斯達政權的外交政策和遵行第三國際命令的雙重目的，從其一貫反資反帝的立場轉向「反法西斯民族大同盟」。在國內停止政治鬪爭，加強「聯合陣線」的宣傳；在對外的態度上，也一反以往反美的主張，並進而視美國為古巴利益所不可或缺的「友邦」，甚至認為在大戰結束後，也須與美國保持友好而密切的關係，以利古巴經濟的發展^③。及至第三國際於一九四三年五月宣佈解散時，古共的立場與政策又向右跨躍了一步。在國內不僅主張放棄階級鬪爭，甚至效法美共頭子伯勞德(Earl Browder)的「修正主義」^④，提出「資本主義和平過渡」的說法，並於一九四四年將「共產主義革命聯盟」易名為「人民社會主義黨」(Partido Socialista Popular—PSP)。古共於此時重新命名，除了「招牌」的更換，尚具有相當成分的實質意義——「機會主義」。

一九四四年古巴大選，巴蒂斯達依法不能參加競選，而由「古巴革命黨」(法統黨)黨魁格拉烏(Ramón Grau San Martín)當選總統。格氏是一個堅決反共的民族主義者，執政初期，極需其他黨派在國會中的支持，故接受古共之合作建議，虛與委蛇，將國會參議院議長席位畀予古共要員馬里奈略，並准古共繼續控制「古巴工人聯合會」。不過，格拉烏應付古共的手段乃是一招「緩兵之計」，旨在換取一個充分鞏固其權力基礎的機會而已。迨至一九四六年夏的國會選舉結果揭曉，「法統黨」在國會中穩操勝算時，格拉烏遂向古共展開奪權鬪爭，首先攻擊的對象是古共勢力所盤踞的「工聯」。格氏派遣其親信帕里約(Carlo

註^② 自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四年，古共黨員人數增至三七、〇〇〇人，但此一數字未經古共之證實。參 Andrés Suárez, *op. cit.*, p. 6; 其可靠數目應為一四、七〇〇人。

註^③ Blas Roca, *Los Fundamentos del Socialismo en Cuba (Havana, 1943)*, p. 111.

註^④ 伯勞德自一九四三年即主張美蘇和平共存，資本主義和平轉變，停止社會主義論爭等，且進而於次年五月解散「美國共產黨」，代之以「共產主義政治協會」(Communist Political Association)。

Prió Socarrás)擔任勞工部長職，帕某藉「工聯」反共人士及其他反共團體²²之助，從古共的手中將工會的領導權接收過來。古共一旦失去了對「工聯」的控制權，即等於喪失了其歷年來所賴以生存的「力量資源」。這是古共自取得合法地位後所遭受的一次最爲嚴重的打擊，從此便進入一個長期的低潮，直至被卡斯楚所吞併。

古共在「法統黨」兩任總統的主政階段²³，因遵循美共的伯勞德路線而導致重大的失敗，並曾爲此加以檢討²⁴，但並未予以改正或揚棄，其故安在？甚至在其日後與巴蒂斯達獨裁者相抗衡，以及和卡斯楚相周旋時，均未脫離其「機會主義」的傾向，值得吾人略加分析之。古共之所以不能乃至不敢在路線與政策方面改弦更張，實有其「不爲」與「不敢爲」的主客因素之存在，如：古共始終認爲繼續保持合法的地位，仍可在政治參與中發揮其影響力，並可在政治活動中（選舉）獲得相當的利益²⁵，因此，必須與執政黨保持一個「適當的安全距離」。古共另一項經常影響其政策的基本觀點是：過激的暴力路線必會招致美國的強烈反應，故將保守的「機會主義」路線視同「保黨」、「保國」的上策。這一觀點也是古共嗣後未能冒然參與卡斯楚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原因之一。此外，古共組織的日趨「官僚制度化」，也形成它難以適時地調整其政策的阻力。

古共遂因迫於形勢而因循，復因惑於利害而苟安，不得不行走在「以不變應萬變」的「保守主義」與「唯近利是圖」的「機會主義」的矛盾夾縫中，從低潮一步一步地滑入覆亡的暗流。

七、古共與巴蒂斯達及卡斯楚

一九五二年是古巴與古共命運的一個轉捩點。是年春三月，古巴島上又颳起一陣政治風波，嗜權好利的巴蒂斯達從美國的弗羅里達捲土重來，發動了第二次政變²⁶。面對著巴氏的政治震撼，古巴舉國上下爲之譁然。然而敢於公然反對巴氏獨裁者，只有

²² 在格拉烏當政時，古巴存在著兩個傾向民族主義的「革命」組織——「革命社會主義運動」(Movimiento Socialista Revolucionario-MSR)和「革命起義聯盟」(Unión Insurreccional Revolucionaria-UIR)。後者自一九三〇年代便在哈瓦那大學設有「行動小組」，卡斯楚於一九四五年加入了「小組」。「行動小組」會協助「法統黨」在學生團體及工會組織中從事清共鬥爭。

²³ 「法統黨」兩任總統爲格拉烏(一九四四—四八年)與前勞工部長帕里約(一九四八—五二年)。帕氏繼承了格拉烏所留下來的爛攤子，社會上弊病叢生，政府無能而貪風極盛，人心思變而暴力橫行。「法統黨」的稅政，爲野心家巴蒂斯達製造了一九五二年春二度政變的藉口。

²⁴ 羅卡將古共的失利歸咎於伯勞德的「反馬克斯理論」。請參 Stuart Cole Blasier, *The Cuban and Chilean Parties-Instruments of Soviet Policie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5), 6. p. 98.

²⁵ 古共在一九四八年的總統選舉中，以馬里奈略爲候選人，獲得一四〇、〇〇〇張選票，佔總投票率七、五%。

²⁶ 一九五二年古巴依憲舉行總統改選，古共因力整而未參加。由「法統黨」、「正統黨」(Ortodoxo 該黨之正名爲「古巴人民黨」(Partido del Pueblo Cubano-PPC))係Eduardo Chibas 於一九四六年自「法統黨」分裂而成之小黨)和「統一行動黨」(該黨係巴蒂斯達於一九四八年自美返國後所建)的三黨候選人角逐之。巴氏見選機於己不利，遂先發制人，以政變方式攫取政權。

「法統黨」及以哈瓦那大學為中心的知識青年等兩股力量。前者遭巴氏的摧殘而屈服於其淫威之下，後者則前仆後繼，成為反巴的主力之一^⑳。而古共則一本其觀望、妥協、鬭爭交互為用的策略，與其八年前的政治伙伴保持著一種相當微妙而曖昧的對立關係——有限度的對抗關係。

古共與巴記政權之所以出現如上之關係，主要造因於雙方當時所處之時代背景及政治環境。我們知道四〇年代的國際關係與五〇年代的國際關係迥然不同，質言之，二次大戰期間的美蘇同盟關係與大戰後的東西冷戰關係截然不同。這層外在關係照樣反映在古共與巴蒂斯達政府的關係上。即由於當時巴氏政權與美國當局有著「良好的默契」，所以巴某毋需古共的合作，而「正統的古共」也不便，同時也不敢背著莫斯科的立場去向巴蒂斯達表示支持。其次，當時古巴的內政也支配著古共與巴蒂斯達之間關係的發展。由於巴某係以違憲的非常手段奪取政權，故引起全國人民之責難，尤為政黨人士及知識分子所不齒。在此情形下，古共自不肯甘負「助紂為虐」之罪嫌，向巴氏靠攏；而巴某此時的自身力量與外來的支持，已足以有效地維持其統治，自毋庸再事拉攏古共。

下面所列舉的幾項事實，可作上述關係的最好說明。當巴蒂斯達初攫政權時，古共頭子羅卡曾就此作出溫和而有節制的批評，並將巴氏政權與「法統黨」政府同等看待，認為二者均為民主資產階級、外國資本主義、大蔗農利益的代理人^㉑，而且皆是美國佬的僕役，唯華盛頓之命是從。而巴蒂斯達之對古共，則同樣報之以寬容。當莫斯科藉機與古巴斷交時^㉒，巴氏政權雖因此對古共施之以顏色，於一九五三年十月底宣布古共為非法組織，但仍對古共網開一面，其黨的活動與機關刊物依舊運作無阻，甚至連古共高幹在哈瓦那的起居也未遭到秋毫無擾。

關於古共與卡斯楚的關係，或說古共對卡氏「革命行動」所採取的態度，可以簡要地歸納出如下的一個模式：批評→觀望→投降。古共對卡斯楚「七·二六運動」的反應模式，同樣是其「機會主義路線」的產物——必然的邏輯產物。當卡斯楚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向聖地牙哥（Santiago de Cuba）的蒙卡扎軍營（Moncada Barracks）發動其「反巴蒂斯達暴君」的第一擊時，古共立即攻擊卡斯楚的行動為「違背人民利益的冒險暴力活動」^㉓，並且聲稱：「人民社會主義黨對一小撮資產階級所發

註^⑳ 在巴蒂斯達政變後不久，哈瓦那大學的哲學教授 Garcia Bavcena 即策劃發動一項倒巴運動，事洩而敗，漏網分子多為卡斯楚所吸收，參加了「七·二六運動」。

註^㉑ Andúes, *op. cit.*, p. 19; Boris Goldenberg, *op. cit.*, p. 78.

註^㉒ 莫斯科與哈瓦那斷交的表面理由是：古巴安全人員違反國際慣例，對蘇聯使館的郵袋強行檢查。但此類意外事件儘可訴諸交涉或抗議，而不必以斷交行為報復之，其實，蘇聯的此一過激反應是另有作用的。

註^㉓ *The Daily Worker* (New York, CPUSA), Aug. 10, 1953, as quoted in Maurice Zeitlin and Robert Scheer, *Cuba: Tragedy in Our Hemispher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p. 118.

動的暴力行爲，表示譴責」^①。即使在卡斯楚於一九五七年自墨西哥捲土重來，於該年二月向巴氏政權從事第二梯次的攻擊時，古共中央曾函告卡氏所領導的「七·二六運動」稱：該黨特別反對卡氏及其同夥所從事之游擊恐怖活動，以及沒有廣大羣眾所參與之反巴蒂斯達運動。

古共之所以一再指責「七·二六運動」的「暴行」，並非表示古共崇尚和平或「人道主義」，而是古共相信：基於古巴當時所處之國際環境與其國內情勢的分析，訴諸暴力的「革命行動」之成功機率幾等於零。古共基於自身之利害，當然不會贊成或參與這項自信終將導致悲劇的「運動」，更何況該「運動」的領導權還在別人的手中呢！

直至「七·二六運動」接近勝利的前夕，古共始於一九五八年春在黨內進行辯論，檢討其與卡斯楚的關係，決議准許共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及身分參加「七·二六運動」的反巴蒂斯達政權的活動，然而古共自身則仍採極為謹慎的觀望態度。嗣後，古共鑒於國內情勢的發展愈加對己不利，遂在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派遣其二號頭子羅德雷格茲前往卡斯楚的游擊基地——馬埃斯特拉山（Sierra Maestra），與卡氏兄弟進行建立「聯合陣線」的會商。

客觀形勢的發展遠超古共意料之外。當上述「會商」尚無任何實質進展之際，卡斯楚的「革命軍」便在一九五九年元旦推翻了巴蒂斯達的獨裁政權。卡氏的最後勝利在古共的領導階層引起了一陣劇烈的震撼。羅卡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於當月六日發表了所謂「元月聲明」。「聲明」中除了提出四項政策性主張外，並允諾將對未來的新政府提供「全面必需的支持與合作」^②。這項「聲明」不僅顯示古共對政治現實的低頭，同時也表明它將再次採取「機會主義」的措施——向卡斯楚的「七·二六運動」靠攏。

八、結語：前期古共的敗亡

古共原以為不能成功的事，卡斯楚竟然完成了；古共認為不可行的事，卡斯楚行了，而且終於獲得勝利了。這對一個信奉「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古共」言，應不會視之為一個偶然的事件吧！尤其對信仰「唯物主義」的羅卡言，即令他不肯承認其領導路線的錯誤，也不能不向「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與殘酷的現實低頭了，因為形勢比人強，這是不能抗辯的事實。

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與自我的辯護，古共終於在一九六一年夏季與「七·二六運動」達成了一份建立「聯合黨」的「七月同意書」，根據這份「同意書」，古共、「七·二六運動」與「學生革命委員會」組成了一個「統一革命組織」（參註^③）。古共加入「統一革命組織」後，於當年十月底即正式停止了自身一切的活動，也從此消失於卡斯楚所領導的「新古共」——卡斯楚主義的古巴共產黨之中。

註^① Boris Goldberg, *op. cit.*, p. 79.

註^② 古共在其「元月聲明」(The January Theses of the PSP)中所提出四項政策性主張：一、徹底解決巴蒂斯達的政治組織，使反抗軍（「七·二六運動」）為新國防軍主力；二、公佈一九五八年十月在馬埃斯特拉山所制定之「土地法」（古共未參與其事）；三、與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貿易關係；四、恢復一九四〇年憲法，組織臨時政府，遵照一九四三年選舉法，實施選舉，建立民選政府。